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周 游

(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内容摘要】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关键词】汪伪政权;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

【作者简介】周 游,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史、社会史。

1940 年 3 月 30 日,正当中国人民奋力抵御日本侵略者处在极其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之际,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的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伪建立后,出于政治的需要,除了承袭战前国民政府的名称、组织和机构形式外,还着意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为自己服务^[1]。作为民国国庆的“双十节”,便是这种政治符号之一。而对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学界还缺乏研究^[2],本文就是通过考察汪伪对“双十节”的纪念,来观察汪伪如何运用这一政治节日,在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的同时,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一、汪伪政权“双十节”的纪念活动

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日本曾于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3 月,分别在北平和南京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两个伪政府并未有明确的纪念“双十节”活动,直到合并组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加以纪念。其所以如此,大概与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在国民党内曾经拥有的地位,以及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需要承接既往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资源以附会其合法性有关。

汪伪的“双十节”纪念活动,与战前的 205

南京国民政府和战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一样,也很注重仪式的“威严”。1940年9月4日,汪伪颁布训令,重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通令,要求各种庄重集会列入“恭读总理遗嘱”,但禁止游乐场所“轻褻滥用”,表示“事变以来”,秩序未复,各游乐场所“不明所以”,列入“恭读总理遗嘱”一项,“有碍本党尊严”,对总理有失“敬意”。因此,汪伪通令各党部,“就地切实指导”^[3]。1942年11月3日,伪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国庆日”行阅兵礼,卫戍地和驻扎地均举行大阅。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或最高军事长官会同中央各军事部长行之,汪伪统治下的各省由驻扎在该地的最高军士长官行之。行阅兵礼时,除过“特别事故外”,各机关部队军官均应服常礼服佩刀莅场参加。对鸣放礼炮的时间,汪伪规定在“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总理诞辰日等节日正午进行^[4]。

汪伪在“双十节”纪念中注重仪式庄重“威严”的同时,像唱“国歌”“恭读总理遗嘱”与“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这些南京国民政府常用的仪式也必不可少。这些象征政权合法性的仪式,不仅在汪伪中枢、各级政权的纪念仪式中普遍存在^[5],就连为庆祝“国庆”而举办的学生运动会中也有此种仪式。如1942年“双十节”,汪伪在南京举办学生运动会,其纪念仪式中就设有“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最敬礼”和“恭读国父遗嘱”等^[6]。

除过这些纪念仪式外,汪伪还利用修建与国民革命相关的纪念建筑,来体现自身的“正统”性。在1942年“双十节”纪念会

上,汪精卫报告修建纪念祠和纪念塔的意义,认为原纪念塔上的文字,大多记载不全,为保存国民革命的整体观念,要求将自广州起义以来所有“阵亡军人”“就义党员”以及致力中华民国建立的死难者全部加以“崇祀”^[7]。同时遵照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祠堂改建为“国民革命烈士灵位”,右刻“总理遗嘱”,左刻“国歌”。纪念塔内刻“国父遗训”^[8]。之后汪伪政权颁布训令,要求在“国父逝世日”(3月12日)、“国父诞生日”(11月12日)两个时间,对革命先烈“分春秋二季举行祭典”^[9]。

“双十节”有“庄重”的一面,还有“欢庆”的一面。汪伪在“双十节”也通过开展一些游艺活动来展现自身的意识形态,如播放电影、广播演讲等。在1942年“双十节”纪念期间,汪伪就安排“中华电影公司巡回放映班”放映体现“中日友好”的“日使访华影片”^[10]。1944年“双十节”,汪伪不仅要求各影院于10月9日起,一律放映有关国庆纪念及“复兴建设”之影片外,还在广播节目中安排了“国府要人”的“双十”纪念特别演讲,以及出席“大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代表做广播演讲^[11]。

在“双十节”,汪伪也会邀请“外国官员”“共庆”,以显示自身政权并非孤立,而是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届时,法西斯各轴心国的“驻华使节”与汪伪的“驻京长官”,均会到场“观礼”和参加宴请活动^[12],如1943年“双十节”,褚民谊在鸡鸣寺欢宴各驻南京外交团人员,其中有日本“大使”谷正之、“满洲大使”吕荣寰、西班牙“公使”麦唐纳、丹麦“公使”高霖等^[13]。汪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在福州路警察俱乐部举行茶会,招待“外宾”“市政咨询委员”及“各界领袖”,席间“中外嘉宾”“互祝国运昌隆”,情绪极“热烈”^[14]。德、日等法西斯国家亦利用此“国庆”时机,表示对汪伪的支持。1942年“双十节”,德国元首希特勒致电汪精卫,祝贺“中国国运昌盛,前途无量”^[15],1943年“双十节”,日本天皇、德国元首希特勒分别发来贺电,向汪精卫表示祝贺^[16]。

二、对辛亥革命的阐释与 “中日和平”的建构

汪伪政府的“双十节”纪念活动,形式上与同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并无大异,但体现的主题却大相径庭。

“双十节”是纪念辛亥革命的政治节日,其纪念主题必然与对辛亥革命原因、意义、成败的阐释有关。在这些问题的阐释上,汪伪与重庆国民政府形同实异。

表面上看,它们之间的说法有不少相同之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伪政权中任宣传部次长的周化人总结了三点:即清廷外交失败、敷衍立宪、农业经济基础的动摇^[17]。而辛亥革命成功的要素,陈景华在纪念文章中称,是自惠州之役至黄花岗之役的“一贯的”“悲壮热烈”“屡仆屡起”,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18]。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周化人称,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政治革命”,它使自秦以来两千年专制制度宣

告结束。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权革命,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自觉的第一声”^[19]。陈景华表示,辛亥革命粉碎专制创立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是“五千年专制与共和的分界点”,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挣脱五千年专制势力的“更始之日”,也是“国家民族的新生与民族斗争的开始”。陈还指出辛亥革命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是中国起死回生的一剂“续命汤”^[20]。

辛亥革命最后是成是败?汪伪集团大体也持成败各半的论调,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是“对内的民族革命的成功”,而不是“对外的民族革命的成功”,更不是三民主义的成功;辛亥革命在对内推翻清廷方面是成功的,在对外摆脱列强方面,建立“全民族政治与发达国家经济”方面都遭挫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的遗憾”^[21]。而失败的原因,或强调民国建立后,一部分同志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不必再进行艰苦的奋斗,他们于是卸下精神的武装,走上享乐之途,更有一部分意志薄弱对主义缺乏信仰的人,在利诱之下居然中途变节,向“反革命的势力投降”,导致反革命的势力压过革命的势力^[22]。或指当时革命者对革命认识不清,对革命主义和政纲没有充分研究,在实际中只注重“民权与政权之争”,而没注意到“党”,尤其没有注意到“党的下层工作”,没有使“党”与民众发生关系,“党”等于说“只有栋梁而没有基础”^[23]。

这些论述确实是战前的南京政府和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经常提到过的,不足为奇;但在这些表面一致的背后,汪伪还

有蓄意的“暗度陈仓”，强调“中日和平”历史“合理性”的目的。

汪伪集团“讴歌”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国，抵制列强侵略，但对待列强的态度，却“爱”“憎”各异，强调对中国侵略的是英美，日本则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近代中国之所以要“革命”，是为“排除英美的侵略”“求民族地位之平等”^[24]。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所以不能实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一般民众忽略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未能与日本“同甘共苦，互相提携”，更“不幸”的是被英美“所挑拨所离间”“随使两国同胞，格莫误会”^[25]。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汪伪不但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其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帮助，高唱“中日和平”。汪伪集团肆意发挥和夸大革命党在历史上与日本的关系，宣称孙中山自致力革命以来，即认定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须“获得日本之谅解与援助”。因此，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致力于中国革命“专于联络日本有志之士”，而日本人同情中国革命，不惜牺牲生命，原因就在于其认定“日本要保卫东亚，藉以保卫自己，必须寻找一个同力合作的友邦”。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正在于“日本之策励所致”^[26]。

在“双十节”纪念中，汪伪极力也阐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其在1924年11月路过日本神户时受邀发表演说时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希望日本战胜俄

国、成为东亚强国之后，发扬王道与仁义的文化精神，联合中国共同领导亚洲各民族，对抗西方以强权与功利为基础的“霸道文化”^[27]。但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其“民族主义”中颇具歧义性的一个问题，它的主旨是联合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反抗西方侵略，而且这种联合主要是中日联合，孙的整个革命生涯都不排斥“中日亲善”“中日合作”^[28]。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内涵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为汪伪的解释提供了空间。

汪精卫在1940年“双十节”纪念中就说，中日“共存共荣”“协力前进”，不仅可以完成“建国工作”，也能藉此实现“总理怀抱之大亚细亚主义”^[29]。1941年“双十节”有人写文章特别引出孙中山“中国革命之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之遗言说事，说中国之“民族运动”应遵照“国父大亚洲主义的遗训”，努力和日本“取得协调，敦睦邦交”“提携合作”，使中国复兴与日本发展“利害一致”“共同努力于新东亚之建设”^[30]。1944年“双十节”，陈公博演讲称，中国参加“大东亚战争”，是吻合“国父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是遵循“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努力迈进”的“国父遗嘱”。中国这次“参战”，不只为自身求解放，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求解放”。因此，中国人民“应与日本协力，保卫东亚，和解放东亚”^[31]，充分认识国父所指示之国民革命方针，觉悟“大亚细亚主义”，乃是救中国与保卫东亚之“唯一大道”与“最高原则”^[32]。

汪伪把“大亚洲主义”阐释为“中日一

体“中日亲善”，其方式就是要以“和平运动”的方式消弭抗战，与日本计划的“大东亚共荣圈”连接起来，所谓“和平、反共、建国、兴亚”，进行“国民运动的再出发”。中日两大民族应同时于“此次不幸之战争中反省”，以最大之努力和决心，扫除过去的一切纠纷，建立日中“亲善关系”^[33]。

对于“和平运动”，汪精卫在1941年“双十节”演说中称，“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与孙中山之革命运动“一脉相通”，革命运动之目的在于“打破帝国主义之压迫”，摆脱被殖民之地位。而当今“救国即是兴亚，兴亚即是救国”，同属一个问题，“和平反共亦如此”。日本提倡建设“东亚新秩序”，中国应极力配合，不仅可保中国“独立自由”，也可实现“东亚之解放”，这才是辛亥革命之“道途”。“和平运动”要实现，要有和平的“方法”，汪精卫认为“和平方法”，应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扫平反日抗日力量的“清乡”运动乃“保障和平方法也”^[34]。汪伪同时也表示，重庆和延安的抗战行为“破坏”了“和平”，把中国送进战争深渊，声称要打破一切“和平”的障碍，把中华民国“从渝共的挟持下夺回来”，完成“复兴建设”^[35]。

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汪伪却极力美化，颠倒黑白地说“中日战争”是求东亚民族之平等，“以达到全世界之永久和平”，它的目的虽与辛亥革命不同，但是意义却“并无两样”^[36]；“大东亚战争”是“决定大东亚各国家民族的命运战争”，大东亚的兴亡，在此一战，中国的成败，也在此一战。中国与日本“共荣共存”，共同努力

于“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即无日本”^[37]。

三、连接“孙—汪”与汪伪 “正统性”的凸显

附庸日本的汪伪政权，为了建构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在其政治话语里，仍言必称“国父”“总理”，以孙中山的信徒、国民党“正传”自居。这在“双十节”纪念中也不例外。如1940年“双十节”，汪精卫在演说中表示，处此时刻应对“总理”孙先生的困苦与“诸先烈就义之壮烈”表示追念^[38]。1941年“双十节”，汪在叙述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时，亦称“国父”孙文先生自中法战争败北，既有革命之志^[39]。

汪伪歌颂“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并非真正意在表示“无限敬仰”，相反，目的在于强调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并逐渐抬高汪精卫地位，将汪精卫与孙中山连接起来，建立革命系谱，以构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汪伪表示既然辛亥革命的任务并未达到，孙中山与辛亥先烈的遗志就要有人承继，重庆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连接孙中山与蒋介石，汪伪则以“和平、奋斗、救中国”来连接孙中山与汪精卫。汪伪强调自身尊奉“国父遗教”，继承了“旧国民政府的法统”^[40]，而汪精卫领导之“和平运动”，是“奉行国父遗教”，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东亚民族自觉”为理论基础，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之业”，完成中国的“复兴建设”^[41]。

在纪念“双十节”的政治话语中，汪精

卫被一些官员与文人描述为孙中山事业的“唯一”继承者。1942年“双十节”，笔名“一呆”的作者强调，汪精卫在辛亥时期就始终跟随孙中山革命，是孙的“唯一信徒”，也是我们今日的“唯一领袖”^[42]。笔名“韦人”的作者在“纪念”文章中进一步声称，汪精卫不仅继承了“总理遗志”，而且提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国策”，并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运动”^[43]。

“旧国民政府”党国一体，汪伪在“双十节”纪念中也从党国一体上论述自己的“正统”性。汪伪集团不仅强调自身政权的“正统”性，还说自己是“正统派”的国民党，是继承辛亥革命的一贯精神，为“真正革命”的国民党^[44]。汪伪称，“我们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保姆，中华民国三十一岁了仍然疾病交加，是“保姆没有尽到责任”，中华民国未能“强壮”，国民革命未竟全功，完全是“我们国民党员的责任”^[45]。

以此基调出发，与重庆国民政府高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做法相对，汪伪也在“双十节”强调“三个一”的论说，以此抬高汪精卫在伪国民政府中的地位^[46]，并凸显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

“三个一”的论说源自汪精卫的“中心势力”说。1941年6月，汪精卫在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和平运动必须以一个主义为中心思想，以一个中心势力为最高领导”的主张^[47]。会议闭幕时，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林伯生明确提出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中心势力”的论说，林表示“一个领袖”就是以汪精卫为最高领袖，“一个主义”就是以汪精卫所谓的

三民主义为主义，“一个中心势力”就是以“国民党”为中心势力^[48]。

“三个一”论说提出后，在汪伪“双十节”纪念中不断被阐释和强调。1941年“双十节”，蔡培在纪念文章中称，国家是一个组织，要使这个组织坚固，就必须有一种中心势力来维系，在中国，这个中心势力就是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以太阳系为例，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犹如“国民党”是现政府中心，太阳周围是行星，犹如“国民党”周围是各党派。行星与太阳既有离心力，又有向心力，两力的平衡使行星整日绕太阳旋转。现政府则在“和平、反共、建国”大旗下，与“国民党”合作到底^[49]。1942年“双十节”，李之柰为如何从事“复兴”工作确定了一个“大目标”，即“拥护一个伟大领袖——汪主席”“信仰一个中心思想——三民主义”“共同站在一个中心势力——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之下”^[50]。金山则进一步强调，“本党是拯救中国之唯一的党，三民主义是建设新中国之唯一主义”，汪精卫是“救党救国之唯一领袖”^[51]。

这样，汪伪利用在“双十节”纪念的时机，在话语上不断强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连接“孙—汪”，建构革命系谱，而且不断高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中心势力”的论说，为汪精卫进行权力鼓吹，并以此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对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的“双十节”，汪伪政权建立后，也予以积极纪念。这是因为“双十节”承载着革命先烈建国的历史记忆，是追述和重构这些历史记

忆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对“双十节”纪念的这一意义汪伪是深知的。因此,汪伪每逢“双十节”都会大张旗鼓予以纪念,他们不仅通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来展示自身的合法性,而且还在纪念主题上进行发挥,通过重新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中日一体”,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方面的多面性。///

(本文系200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课题编号:09JZDW004;湖北省2010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纪念与阐释:政府党派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课题编号:[2010]19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还获得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资助,资助编号:PY2012014。特此感谢!)

注释:

[1]据张生研究,汪伪政权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在时空和内容上非常之多,如谒陵、政治理论、国旗、孙中山遗教等。见张生《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2]关于民国时期政府党派的“双十节”纪念,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学智的《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2006年第5期;何卓恩、周游的《“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刘伟、李佩佩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拙作《边区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

“双十节”纪念》,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

[3]《国民政府训令》第143号,载(伪)《立法院公报》第17、18期合刊第116页,1940年9月5日。

[4]《陆军礼节条例》第89、92、93、97条,载(伪)《立法院公报》第20期第34、35页,1941年11月3日。

[5]如1941年汪伪中枢,1943年南京庆祝“双十节”都有这些仪式。见《国民政府庆祝国庆,主席训示革命精神》,载《民国日报》(南京)1941年10月11日《首都国庆纪念大会》,载《民国日报》(南京)1943年10月10日。

[6]《纪念双十国庆,首都学生运动大会今日隆重开幕》,载《民国日报》(南京)1942年10月10日。

[7][9]《举国腾欢普天同庆——三十一年国庆典礼志盛》(专载),载(伪)《外交公报》第75期,1942年11月1日。

[8]《革命烈士祠纪念塔修缮工程告竣》,载《申报》1942年10月10日。

[10]《日使访华影片定期放映》,载《申报》1942年10月10日。

[11]《国庆日首都庆祝行事决定》,载《申报》1944年10月5日。

[12]《举国腾欢普天同庆——三十一年国庆典礼志盛》(专载),载(伪)《外交公报》第75期,1942年11月1日。

[13]《褚外长欢宴各国使节》,载《申报》1943年10月12日。

[14]《全市热烈庆祝双十国庆纪念——各界民众举行庆祝大会》,载《申报》1944年10月12日。

[15]《庆祝国庆典礼昨日隆重举行》,载《申报》1942年10月11日。

[16]《南京十日中央社电》,载《申报》1943年10月12日。

[17][19]周化人《辛亥革命三十年》,载《大亚洲主义》第3卷第4期,[南京]中国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1年10月15日。

[18][20][41]陈景华《继承先烈遗志完成本党的使命》,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14-15、14、18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21]郑燕生《我拿什么贡献给国庆纪念》,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26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22]苏成德《坚持革命的斗志》,载《大亚洲主义》第3卷第4期第33页,[南京]中国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1年10月15日。

[23][42][44]一呆《起义后之武汉军政与党务》,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32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24][36]质纯《纪念国庆必须促进和平》,载《三民月

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7、8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25]《国庆纪念之感想——湖北省政府杨主席广播词》,载《新湖北月刊》1942年10月10日。

[26]秋虫《辛亥革命机关之沿革谈》,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5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27]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1-4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8]王道《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29]《国庆日感想汪代主席发表谈话》,载《盛京时报》1940年10月11日。

[30][49]蔡培《怎样纪念民国三十年的双十节》,载《民国日报》(南京)1941年10月10日。

[31]《国民应加倍努力——卅二年国庆日陈市长广播词》,载《申报》1943年10月10日。

[32]《中枢隆重举行国庆纪念典礼 陈代主席宣读训词》,载《申报》1944年10月12日。

[33][38]《国庆日感想汪代主席发表谈话》,载《盛京时报》1940年10月11日。

[34][39]汪精卫《三十年国庆日致辞》,载《民国日报》(南京)1941年10月10日。

[35]郭秀峰《努力复兴建设——纪念三十年双十节》,载《大亚洲主义》第3卷第4期第24页,[南京]中国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1年10月15日。

[37]社评《国庆日的愿望》,载《申报》1944年10月10日。

[40]杨鸿烈《三十年度国庆日感言》,载《大亚洲主义》第3卷第4期第35页,[南京]中国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1年10月15日。

[43]韦人《国庆纪念与我们应有的新勉励》,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23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45]冯建中《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感言》,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22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46]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仅其他伪政权被并入汪伪国民政府,先前与汪精卫的“国民党”相抗衡的“大民会”“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与“共和党”等伪组织也加入汪精卫的“国民党”,并自行解散。对此,汪精卫并不满足,他想成为“和平运动”的“最高领袖”,实现他的领袖欲。“三个一”的提出也有此方面的考虑。参见蔡德金、刘松茂《走向深渊:抗战时期的汪精卫》第278-27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7]《汪精卫拟定宣传工作人员训条》,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上)第553-55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8]林伯生《现阶段宣传的斗争》,载《中央导报》1941年第1卷第45期,转引自蔡德金、刘松茂《走向深渊:抗战时期的汪精卫》第278-27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0]李之桢《纪念国庆与我们今后应有的努力》,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2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

[51]金山《辛亥前后革命成败检讨》,载《三民月刊·双十专辑》第2卷第4期第10页,[汉口]三民编译社1942年10月10日。